

# 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 30 年回顾

胡德坤 赵文亮

---

**【提要】** 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有着七十多年的历史,但真正形成高潮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 30 年。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学者对二次大战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可以说是硕果累累,是我国世界史研究中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之一。从而使二战史成为世界现代史、国际关系史和外国军事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专门领域。30 年来,中国二战史研究和教学队伍不断壮大,并在研究方面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

**【关键词】** 中国 二战史研究 30 年

---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战争。一方面,这场由法西斯国家挑动的侵略战争给遭受侵略的世界各国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可以说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另一方面,世界各国和人民进行的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的解放战争,它对整个世界、尤其是战后世界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其影响无处不有,无处不在,人们对其仍记忆犹新。战后六十多年来,世界各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尤其是历史学家们,出于对人类前途和命运的终极关怀,一直在思索和探究这场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的根源、进程、结局和影响,以期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确保人类的持久和平。因此,在国际上,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二战史便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课题,世界各国、尤其是参战的大国,如美国、苏联、英国、德国、法国以及日本等国对二战的研究尤其重视,研究高潮此起彼伏,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可谓汗牛充栋。相比之下,我国的二战史研究则相对落后,直到 1978 年改革开放后,才迎来了学术的春天,兴起了研究高潮,带来了学术繁荣。

战后 60 余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 30 年,中国学者对二次大战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可以说是硕果累累,是我国世界史研究中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从而使二战史成为世界现代史、国际关系史和外国军事史研究中一个最重要的专门领域,并成为世界史学科中的一门显学。在改革开放 30 周年之际,我们回顾中国二战史研究 30 年的学术发展史,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中国二战史研究有着七十多年的历史,但真正形成高潮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 30 年。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中国学术界就开始了在当时国际政治中的热点问题——法

西斯主义问题的介绍和探讨,学者们撰写和翻译出版了一系列有关法西斯主义的著作,发表了数以百计的文章,对法西斯主义的起源、特征、理论以及法西斯重要人物希特勒、墨索里尼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和研究。大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学者随即开始了对二次大战的全面研究。最初主要表现为一些战地记者如萧乾、乔冠华等撰写的评论和报道。随后,中国学者开始发表学术论文和出版著作,对二次大战若干重大问题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和介绍。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大战全面爆发到战争结束,中国共出版有关二战的图书153种,其中中国学者著作88种,外文译著65种;各种刊物刊登介绍和研究二战的文章800余篇。随着大战的结束,中国学者进一步加强了对二战史的研究,拓宽了二战史研究的领域,从而使我国在1945—1949年间出现了一个出版二战史书籍的小高潮。据统计,在此期间,我国共出版二战史书籍174种;其中中国学者著作105种,国外学者译著69种。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苏联学习”的口号下,一些军队院校在军事教学中开设了有关苏联卫国战争史的课程。在地方院校的世界近代史教学中也讲授二战史,并出版了一些有关这一课程的翻译著作和教材,当然还出版了一些有关抗日战争的著作。在这一阶段,中国学术界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学者们开始普遍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研究和分析二次大战。50年代中后期,中国学术界围绕着二战的起点、性质、阶段划分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与争鸣。从60年代初开始,二战史的研究开始走入低谷。虽然1949—1965年间出版二战及与二战相关的图书193种,但研究二战的专著则不多,主要是苏联学者所著的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著作,尚未见到大陆学者撰写的专著。在发表的十分有限的160篇文章中,有38篇是国外学者著述译文;在中国大陆学者所写文章中,绝大多数属于纪念性或介绍性文章,属于研究性的文章只有40多篇。

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极“左”思潮影响下,中国大陆的二战史研究跌入低谷,学术园地一片凋零,学术活动基本停顿。据统计,1966—1976年,大陆学者仅仅发表二战史文章35篇,出版图书54种。这些数量少得可怜的二战史书籍和文章,仍停留在知识性读物的水平,且几乎都是为了“反对修正主义”需要的应时之作。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中央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广大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冲破学术禁锢,中国的二战史研究开始走上健康的道路,进入了大发展时期,从而出现了二战史研究的全面繁荣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及军队领导人对二战史的研究十分重视,做了许多重要指示并给予大力支持。1979年2月10日,徐向前元帅在给军事科学院和军事学院(即今国防大学)领导的一封信中,首先提出要恢复战史课,要使指挥员懂得二战战史,他指出:“军事院校设战史课,应视为一门主课之一,我军中高级指挥员不懂或不精通中外古今典型的各种或各个战例,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即不可能深入地熟练地掌握战争的规律和知识,对于以后的指挥作战大为不利。现军事学院拟开战史课我认为非常之好。”在随后答《军事学术》编辑部问中,他又指出:“研究未来的反侵略战争,可以从过去的战争史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找出一些规律来。……我们的指挥员很有必要多读一点书,特别是要读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场问题的书。”正是在徐向前元帅的关怀和鼓舞下,在段苏权、郭化若等老将军的支持下,加快了我国二战史研究会成立的步伐。

1979年7月,首次全国二战史学术讨论会在哈尔滨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专门的筹备组,负责筹建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时任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所长的刘思慕研究员、副所长朱庭光、张椿年研究员,做了大量细致的协商筹备工作。1980年6月,来自46个军队和地方研究单位的74名代表在昆明召开学术讨论会,会议宣布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简称“中国二战史研究会”)的正式成立,会议协商推选出11人组成第一届理事会,由安徽师大陈正飞教授任会长。二战史研究会挂靠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属全国性一级学会。为了规范学会及其会员的组织和活动,中国二战史研究会制订了《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章程》。

在1982年初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中国二战史研究会名誉会长段苏权将军等人联名提出了《加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案》,为会议所通过后被列为第五号提案,并由国务院批交中国社会科学院会同军事科学院研究落实。1982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召开了关于加强二战史研究的座谈会,召集军事科学院、中央党史研究室、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世界史研究所等单位的负责人商议落实第五号提案的措施。会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将座谈意见向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写了报告。1982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三次全国二战史学术讨论会上,就落实第五号提案进行了讨论,制订了《二战史研究会关于落实人大五号提案、加强二战史研究的规划(1982~1985)》。这就把二战史研究提到了政策的高度,对我国的二战史研究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随后,二战史研究会又分别在1982年、1985年、1995年、2001年和2006年进行第二届至第六届换届工作,先后由武汉大学张继平教授(1982—1993)、国防大学黄玉章中将(1993—2001)、武汉大学胡德坤教授(2001—现在)任会长,郭化若、宦乡、段苏权、黄玉章、李殿仁、向守志等参加过二战的老将军、老领导担任名誉会长。

二战史研究会的成立,为军队和地方的二战史学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学术思想、互通研究信息的平台,同时,也催生了军队和地方二战史专门机构的成立。军内外各高校和科研机构对二战史的研究十分重视,设立了专门从事二战史研究的专门机构。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研究力量比较集中的武汉大学(1978年底,张继平负责)、华东师范大学(1980年夏,李巨廉负责)相继建立了二战史研究室。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国防大学、四川大学、辽宁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也分别设立了课题组,集中一批学者对二战史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集体攻关。这些二战史研究机构和课题组的成立推动了二战史研究工作的开展。

二战史研究会成立以来,频繁举办全国性和国际性学术会议。据不完全统计,1979—2008年间,二战史研究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军事科学院等科研单位,国防大学、武汉大学等军队和地方高校,以及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联合举办了全国性学术研讨会七十多次。这些研讨会内容广泛,包括二战的起源、法西斯主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二战前夕国际关系、绥靖政策、二战初期问题、二战军事学术、二战战略问题、中国抗日战争与二战、日军侵华暴行、太平洋战争、中缅战场、二战对战后世界影响、二战与战后国际关系、二战与战后局部战争、二战的经验教训、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人类文明进步、二战与科学技术发展、冷战起源与国际关系、海峡两岸华侨与抗日战争、二战与20

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二战与亚太国际合作、二战及其遗留问题等许多专题,可以说涉及到了二战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和侧面。1985年8月,在由中国社科院、军事科学院和二战史研究会联合筹办的“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杨得志、胡乔木、邓力群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一些参加过二战的老将军出席了开幕式。中央政治局委员杨得志、胡乔木分别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为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中宣部下发文件,要求各行各业加强重视,开展好这项活动。1995年8月,在举国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候,江泽民、尉健行、吴官正、李长春、迟浩田、傅全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杨得志、张爱萍等老将军出席了多种纪念活动,发表讲话,盛赞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意义。2005年9月3日,在北京举行了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以胡锦涛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全体出席,胡锦涛发表了重要讲话。党和国家以及军队领导人对二战史研究的关怀和支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二战史研究的顺利开展。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二战史研究会近几年举办了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一是2005年9月,由中国二战史研究会和重庆市政府联合举办、重庆市政府和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承办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召开,重庆市政府领导和来自中美两国的二战史专家、二战老兵以及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等150余人出席,其中,美方人员达数十人。会议就战时中美合作、战时中美友谊、中国战场在东方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二是2008年4月14—16日,在武汉大学召开了以“1931—1945年占领历史研究”为主题的二战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由国际二战史学会和中国二战史研究会联合主办、由武汉大学承办。国际二次大战史学会主席、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教授格哈德·赫尔施菲尔德及来自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希腊、斯洛文尼亚、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等9国,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单位120多名中外学者及博士、硕士研究生参加了会议,国际二战史学会主席格哈德·赫尔施菲尔德,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中国二战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向守志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刘源中将,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杨松等在会上致辞。这次国际学术会议还安排了“中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专场学术报告会。这是国际二战史学会与中国二战史研究会第一次联合在中国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这些国际学术会议的举办,反映出我国的二战史研究已经与国际二战史研究接轨。

中国二战史研究会成立30年来,始终将国际学术交流作为工作的重点之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二战史学会和中国学者利用请进来、走出去,以及信件往来的方式加强与国外二战史同行的交流和沟通。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所长刘思慕在布加勒斯特参加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发表了《中国抗日战争及其宣传工作》的论文,受到与会同行的重视。1984年春,中国学者金重远访问巴黎,面见了二战史国际委员会主席亨利·米歇尔。1989年8—9月,中国二战史研究会会员、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彭训厚受国防部派遣,赴德国首都柏林参加国际二战史学术会议,宣读论文《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1931—1945)的原因》。1990年10月,中国二战史研究会与社科院世界史所共同接待意大利军事史学会主席鲁拉奇教授。1991年11月,中国二战史研究会与国防大学科研部联合接待苏

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波利亚科夫以及勒热舍夫斯基教授来访。1992年5月,应独联体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的邀请,中国二战史研究会副会长、军事科学院军史部部长王道平少将,率中国军事历史代表团对俄罗斯军事历史研究所和八个教学单位进行了考察访问。1992年6月,二战史研究会会长、武汉大学张继平教授赴美国纽约出席第八届二战史多学科学术讨论会。1992年8月,二战史研究会秘书长张海麟应邀到意大利都灵参加第18届世界军事历史年会,在大会上作了《太平洋战争期间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和分歧》的报告。2000年8月,二战史研究会副会长李殿仁等人应邀参加了在奥斯陆召开的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并分别在会上发言,他们的论文均被收入国际二战史委员会出版的论文集。这一系列的国际学术交流和往来,为中国二战史研究会加入国际二战史学会奠定了基础。

1980年中国二战史研究会成立后,就将加入国际二战史学会作为工作目标之一。但由于种种原因,长时间止步不前。2001年,中国二战史研究会第五届理事会成立后,决定将加入国际二战史学会作为任期目标,学会指定专人负责与国际二战史学会联系、沟通,提出加入国际二战史学会的申请。2002年10月,中国二战史研究会收到国际二次大战史学会的来信,来信通报了近年来二战史国际委员会的工作情况,以及将于2005年7月在悉尼举办会议,邀请中国学者与会的信息。2004年9月,中国二战史研究会副会长徐蓝代表研究会回复二战史国际委员会执行局主席格哈德·赫尔施菲尔德和秘书长彼得·拉格鲁,表示中国将组团参加悉尼会议,并提出中国二战史研究会希望加入国际二战史研究会的申请。2005年7月,中国二战史研究会会长胡德坤、副会长徐蓝参加了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并在国际二战史专场学术会议上发言。会议期间,二战史国际委员会执行局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国二战史研究会的申请,在闭幕会上正式公布了这一决定。于是,中国二战史研究会就正式成为国际二战史学会的团体会员,标志着中国二战史研究正式走上了国际学术舞台,也标志着中国二战史研究会的发展步入了国际化的新阶段。

## 二

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国学者对二战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在人才培养和研究队伍建设方面,中国二战史研究和教学队伍不断壮大。中国社会科学院、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大、首都师大等单位已经培养出百余名硕士研究生和数十名博士研究生。其中,武汉大学胡德坤教授从1994年起开始招收“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日战争”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至今已连续招生15届。这些研究生大多活跃于军队和地方高校教学与科研第一线,研究二战及与二战相关问题,成为中国二战史学界的中坚力量。

30年来,中国二战史研究和教学队伍不断壮大。截止2004年底,登记在册的中国二战史研究会会员共463名,其中,35岁以下者占38.6%,36至65岁者占43.2%,66岁以上者占18.2%。从上述人员的职称结构上看,具有初级职称者占17.9%,中级职称者占34.3%,高级职称者占47.8%。现在已经形成了一支实力雄厚、老中青结构合理的研究团队,共同致力于开创我国二战史研究的新局面。

据我们不完全的统计,我国发表过二次大战及相关方面文章(包括译文)的作者共有 5423 人(不含包括二战史图书作者以及专门从事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作者)。如此庞大的作者队伍,足以说明二战史研究在中国大陆受关注的程度。在全部作者中,有 5137 人发表过 1—4 篇文章,有 219 人发表过 5—9 篇文章,有 67 人发表过 10 篇以上的文章。依据我们的看法,发表 4 篇以下文章的作者是中国二战史研究的“业余作者”;而发表 5 篇以上文章的作者达 286 人,构成了二战史的专业研究阵容。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及相关部委和军队学术机构,对二战史研究都非常重视,设立了许多有关二战史的研究项目。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研究”、“法西斯理论与运动研究”、“德意日法西斯体制研究”、“二战期间英美苏的远东战略与中国抗日战争”、“东京审判与东京审判史观研究”、“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与现状研究”、“1933—1936 年纳粹德国阴影下的英法关系研究”、“战争与和平:两次世界大战的比较研究”、“战时中外关系研究”以及“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历史进程”等十余项资助项目。2005 年,武汉大学胡德坤教授和国内一批二战史专家,申报教育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获得批准,标志着我国二战史研究还处于高潮时期。

第二,推出了大量的有关二战史的著述如专著、译著、论文、资料集、工具书、普及读物等。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的史学工作者不辜负党和国家的期望,在二战史的学术园地上辛勤耕耘,撰写和出版了大量的二战史书籍。据统计,自 1979 至 2004 年的 26 年的时间里,出版图书 1537 种,其中中国学者著作 945 种,外文译著 592 种;公开出版 1326 种,内部印刷 211 种。在公开出版的图书中,中国学者著述 798 种,外文译著 528 种。

从所出版的译著来看,国外著名二战史家的著作绝大多数都出版了中译本。通史方面主要有英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所著两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 年、1980 年版),曾任二战史国际委员会主席的著名法国二战史家米歇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上下)册》(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联邦德国蒂佩尔斯基希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下册)》(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1992 年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苏联学者德波林等主编的 11 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1989 年版)历时 12 年出版完毕。专著方面,研究二战起源的主要有英国麦克唐纳的《美国、英国与绥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8 年版)、美国学者特尔福德·泰勒所著《慕尼黑——和平的代价(上下)》(新华出版社 1984 年版),英国学者泰勒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更是被多家出版社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研究法西斯主义的主要有日本学者井上清的《日本军国主义》(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美国贝尔加米尼的《日本天皇的阴谋》(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和被多家出版社出版和再版的美国学者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研究各战场的主要有英国西顿的《苏德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美国科斯特洛的《太平洋战争》(东方出版社 1985 年版)、日本服部卓四郎的《大东亚战争全史》(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探讨军事战略的有联邦德国卡尔·德雷奇斯尔勒等所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政治与战略》(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和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等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总结与教训》(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战役研究方面有德国汉斯—阿道夫·雅各

布森等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战役：德国观点》（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战时国际关系方面主要有苏联泽姆斯科夫的《欧洲第二战场外交史》（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和英国阿诺德·托因比主编的11卷本《国际事务概览丛书战时编（1939—1946）》（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1990年版），后者历时12年出版完毕。资料方面主要有法国博多等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百科全书》（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联邦德国希尔格鲁贝尔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大事记》（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和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等等，一时间，关于二战题材的译著出版在各学科、各研究领域数量是最多的。这些译著的出版，对我国学者了解国际学术界关于二战史研究的学术发展、观点演变和资料发掘等，提供了便捷的途径。

从中国学者所撰著作来看，结束了“小册子”的时代，各具特色的学术著作如雨后春笋般陆续出版。这些著作对二战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显示了新时期二战史研究的水平大幅提升。这些著作，或以内容全面、体例完整见长，或以主线突出、史实详尽取胜，或以史料丰富、论述精当著称，均可谓二战史研究的精品。中国学者出版的著述大体可分为五类：

一是通史类。对大战的起因、经过和结局都做了较为系统、全面的论述。上世纪80年代有几部中型二战史通史问世，它们是朱贵生等编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黄玉章等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张继平、胡德坤等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胡德坤、罗志刚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90年代，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主编的五卷本大型二次大战通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出版（中国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1998年版），成为二战史通史研究的压轴之作；进入新世纪后又出版了王振德著《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二是专著类。从大战的某一个侧面、某一个层面、某一个专门领域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研究。这是我国学者关于二战史研究成果最为集中的领域之一。关于大战起源研究的著作主要有胡德坤著《七七事变》（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陈兼著《走向全球战争之路》（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齐世荣主编的《绥靖政策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康春林著《世界战争起源新论：东欧与两次世界大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关于法西斯主义的主要有朱庭光主编的《法西斯新论》（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法西斯体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陈祥超等著《法西斯运动和法西斯专政》（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杜美著《欧洲法西斯史》（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在二次大战各战场研究方面，关于欧洲战场的有傅雁南著《D日辉煌：二战西欧战场》（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太平洋战争的有李玉、骆静山主编的《太平洋战争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研究中日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著作主要有龚古今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胡德坤著《中日战争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三卷本《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罗焕章著《中国抗战军事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和肖效钦、钟兴锦主编的《抗日战争文化史1937—1945》（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近年来，中缅战场和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成为新的研究热点，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时广东、冀伯祥著《中国远征军史》（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徐康明著

《中国远征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和陈立人著《缅甸中日大角逐》(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战时国际关系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时殷弘著《美苏从合作到冷战》(华夏出版社 1988 年版),徐蓝著《英国与中日战争》(首都师范学院出版社 1991 年版);王真著《动荡中的同盟: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学院出版社 1993 年版);李世安著《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任东来著《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严双伍、胡德坤著《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法关系》(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罗志刚著《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军事学术方面的有张继平著《历史的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与政略》(时事出版社 1990 年版);黄金鹏著《日军作战理论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倪乐雄著《帷幄与决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决定性会战述评》(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熊伟民著《战时美国的欧洲战略》(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二战对战后世界的影响方面的著作有胡德坤、罗志刚著《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世界性社会进步》(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严双伍著《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欧洲一体化的起步》(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中国抗日战争在二战中的地地位与作用方面的著作有韩永利著《战时美国大国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胡德坤、韩永利著《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在中国二战史研究学术史方面有赵文亮编著《二战研究在中国》(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等。

以上仅列出了中国学者的部分代表作,但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对二战史的研究已覆盖了二战史的各个领域,其中,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在二战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二战对战后世界的影响研究,是国际学术界研究的薄弱环节,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虽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却是开拓性的研究,是二战史研究中的重要亮点。

三是资料汇编、词典和工具书。这类图书信息量大,知识面宽,可供研究者和读者查考。资料汇编主要的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料汇编》(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编译 1982 年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资料选辑(1931—1945)》(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编印 1986 年版)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 1937—1938 年》(李巨廉、王斯德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词典和工具书主要有王斯德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事件人物》(华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李巨廉、金重远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百科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4 年版),陈石平主编的《世界大战实录》(书海出版社 1994 年版),张跃铭、蔡翔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通鉴:1937—1945》(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刘庭华编著的《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1931—1945》(海潮出版社 1995 年版),王捷等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词典》(华夏出版社 2003 年版)等。

四是人物传记和回忆录,通俗读物和画册。中国学者撰写了 180 多部人物传记,涉及到绝大多数二战时的重要人物。其中最集中的是希特勒传记 39 部,墨索里尼传记 11 部,东条英机传记 8 部,罗斯福、丘吉尔各有 10 余部,艾森豪威尔 9 部。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5 年出版的二战著名人物亲历记系列图书 23 本中有 17 本是中国学者所撰写。

通俗读物和画册,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可读性较强。主要有北京五岳文化咨询公司编

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图史》(华夏出版社 1995 年版), 郑志国等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上、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年版), 管辉、苏真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图片档案实录(全 6 册)》(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5 年版), 沈永兴、世华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实录[摄影集]》(重庆出版社 1995 年版), 彭训厚等编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实图集》(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5 年版), 以及人民邮电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等联合推出的邮票集《历史呼唤和平》(1995 年版)等。这些人物传记和回忆录、通俗读物和画册以通俗语言和直观效果, 在学术与普及、学者与读者间搭起了一座不可或缺的桥梁, 使二战史拥有广大读者群和业务爱好者。

五是论文和论文集。发表论文是二战史研究成果最集中的形式之一。据不完全统计, 1979—2004 年间, 大陆学者共发表有关二战史的文章 8634 篇, 其中中国学者撰写的文章 8001 篇, 国外学者文章或资料译文 633 篇。这些文章或资料, 有 7775 篇刊登在期刊上, 295 篇刊登在报纸上, 564 篇收在论文集中。文章的内容涉及到了二战的方方面面。这些论文的特点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 论文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拓展, 资料运用逐渐向发掘档案资料发展。

这一时期出版了 34 部二战史论文集, 其中绝大多数是二战史研究会或其他学术会议论文集。在这 34 部论文集中, 有 11 部收入论文 20 篇以上。其中收录论文最多的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学术》(国防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收录会议论文 39 篇;《侵华日军暴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新华出版社 1996 年版), 收录论文 44 篇;《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论文集(3)》(军事谊文出版社 1996 年版)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论文集(5)》(解放军出版社 1999 年版)分别收录二战史研究会石家庄会议(1995 年)和黄山会议(1996 年)的论文 37 篇;《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世界历史进程》(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收录二战史研究会武汉会议论文 33 篇;《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亚太国际合作》(重庆出版社 2003 年版)收录重庆会议论文 39 篇;《二战及其遗留问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二战史研究会 2004 年编印), 收录二战史研究会 2004 年南京会议论文 40 篇等。这些论文集的特点是内容集中, 专题性强, 学术价值较高。

第三, 中国二战史研究的学术贡献。

改革开放 30 年来, 中国二战史研究领域大大拓宽, 填补了许多领域的空白。

1978 年以前, 中国的二战史研究仅仅局限于个别领域, 只能称得上是起步阶段。1978 年以后, 中国的二战史研究则呈现出千帆竞发、百花齐放的局面, 扩展到二战的各个领域。研究比较集中的领域首推军事学术的研究。据统计, 1979—2004 年间, 发表军事学术方面的文章 1140 篇, 出版书籍 371 种, 位居各研究领域之首。战时各主要参战国家的军事战略与战术、战争动员与战争经济、武器与装备、后勤与供应、军队指挥与运筹、军队编制与管理等问题都有大量的著述出现。在二战的起源研究方面, 涉及到了世界经济与政治危机、国际政治与国际秩序、法西斯主义、绥靖政策以及三十年代的和平主义等重大问题。其中对法西斯主义和绥靖政策的研究尤其重视且成果卓著, 对 30 年代的和平主义的研究也填补了学术空白。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的研究方面, 欧亚抵抗运动和德、日国内的反战运动等, 也有论著问世。在对各大战场研究方面, 诺曼底登陆、珍珠港事件及太平洋战场其他战役、

中缅印战场和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原子弹轰炸等课题都是从前没有涉足的领域。在战时国际关系方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东方战线”、苏芬战争、战争初期的苏德关系、苏日中立条约、欧洲第二战场问题、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在战时的作用问题、华侨与抗日战争问题、抗战时期各国对华政策问题尤其是盟国对华援助问题,关于日本无投降之争、对二战的影响和后果的全面研究、对冷战的起源和雅尔塔体制的研究、对德日战争赔偿和战争反省问题的深入探讨、对战时科学文化的研究、关于二战对战后世界影响的研究、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在二战中地位与作用研究等,都是新开拓的研究领域。对人物的研究也成为热点,几乎所有二战时期的重要人物都有学者进行过研究,有论著予以介绍。当然,二战人物中学者着墨最多的还是轴心国三巨头——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和盟国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

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二战史研究新的学术观点异彩纷呈,学术创新俯拾皆是,从而孕育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时期。同国际学术界相比,中国学者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一是建构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二战史学术研究体系。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二战史研究主要采用西方、尤其是美英的观点。新中国成立后,主要采用苏联观点。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在二战史研究中,逐步建构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二战史学术体系。这种学术体系有两方面的创新。第一个方面是关于二次大战的性质,欧美学者大多只承认 1939 年 9 月德波战争爆发才开始反法西斯战争,从而否定了德波战争前以中国抗战为代表的反法西斯战争;苏联学者则只承认苏德战争爆发后二战才开始具有反法西斯的性质,这种观点既否定了德波战争前以中国抗战为代表的反法西斯战争的性质,又否定了从德波战争到苏德战争爆发前英法等国进行的战争是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世界主要矛盾,认为 20 世纪 30 年代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内崛起,并在德意日上台,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战争威胁,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对新的矛盾,即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矛盾。随着法西斯国家发动的局部战争的升级,以及对世界各国威胁的扩大,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矛盾便上升为世界的主要矛盾。基于这种分析,中国学者认为,二战从一开始,即从 1931 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各国人民的抵抗都是反法西斯战争。即是说,二战从局部战争开始就具备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性质,它自始至终就是一场反法西斯战争。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局部战争和二战爆发时点问题,欧美学者都是以 1939 年 9 月德波战争爆发为二战的起点。中国学者则认为,同一次大战不同,二战存在相当长的局部战争时期,这就形成了二战的一个特点:用局部战争准备全面战争,局部战争必然导致全面战争,全面战争是局部战争发展的结果,从而就使局部战争与全面战争共同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局部战争便成为二战历史的组成部分。根据以上分析,中国学者认为,二战应以 1931 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为起点。具体而言,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是二战局部战争的开端,1939 年德波战争则是二战全面战争的开端。在二战全面爆发的起点问题上,国际学术界存在 1939 年德波战争说、1941 年苏德战争说和 1941 年太平洋战争说等观点,中国学者大多采用 1939 年德波战争说,也有学者将从 1939 年德波战争到 1941 年太平洋战争作为二战全面爆发的一个阶段,其根据是:二战是由局部战逐步扩大为全面战争的,全面战争也是逐步扩大的,也存在着一个全面爆发阶段,这种见解另树一帜,更能反映二战史的发展规律。

上述两个方面是中国学者对二战史学术体系的重大创新。

二是系统深入地探讨了中国抗战与二战的关系,全面论证了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关于中国抗战与二战的关系、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从1980年开始,中国二战史学界就将其作为中国学者必须承担的课题,并开始发表该课题的论文,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刘思慕研究员的《中国抗日战争及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 and 作用》(《世界历史》1980年4期)、齐世荣教授的《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 and 作用》(《历史研究》1985年4期)等。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在该课题方面共发表论文500余篇,其主要论点是:

其一,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起来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站在世界历史最前列,代表着世界历史前进的方向;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始至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中国是东方唯一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国家。自1937年七七事变始,中国开辟了东方、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反法西斯战场,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孤军奋战,以血肉之躯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独自同日本法西斯抗争达4年之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仍是抗击日本的主战场之一,也是世界反法西斯四大战场之一。

其二,中国抗战牵制了日本进攻苏联的北进战略,使苏联避免了东西两面作战的危险。二战期间,日本确有北进政策和南进政策,即以中国为基地,北攻苏联,南攻美英,夺取亚太地区霸权。日本要进攻苏联必须先打中国。日本若对苏开战,其主力必须是陆军。但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将陆军主力投入到中国战场。1939年二战全面爆发前后,苏联面临德国威胁,为日本北进提供了机会,但日本陆军主力投入到中国战场,无力攻苏。1941年6月,德国闪击苏联,为日本北进攻苏提供了最佳时机,日本同样是由于陆军主力深陷于中国战场,无力配合德国进攻苏联。可见,正是中国的抗战抗击着日本陆军的主力,才使苏联免遭日本从背后的袭击,得以全力对付德国。

其三,中国战场还有力地支援了盟国先欧后亚战略的实施。盟国的世界战略是先欧后亚,而要实施先欧后亚战略的前提是要将日军牵制在东方战场,切断日德之间的配合,以便分而歼之。中国抗战阻止了日德在中东会师的计划。1942年3月,日本海军击溃英国东方舰队,进入印度洋,大有与德国在中东会师之势,将会给盟国先欧后亚战略带来严重的后果。但日本陆军被牵制在中国,无法与海军同步进入印度洋地区,致使日本海军无功而返,美英盟军才能从容进行北非地中海作战,使日德各自孤立作战。中国抗战有力地支援了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日本由于陆军主力投入到中国战场,在太平洋战场只能以海军为主,陆军兵力严重不足,因而,开战仅一年,美军便完成了太平洋战场的战略转折,进入战略反攻阶段。

其四,中国抗战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与巩固,并在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是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最早倡导者和积极维护者。七七抗战开始后,中国独自抵抗强大的日本法西斯,急需获得国际支持,因而也最早提出了结盟抗日的主张。七七抗战爆发后不久,中国便正式形成了“联络与国,结盟抗日”的外交方针,积极寻求与美英苏等国结盟抗日。其间,中

国以持久抗战的实际行动抵制了英美的远东绥靖政策,促使美英对日政策从绥靖转向抗衡,为走向最终结盟打下了基础。1942年1月1日,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反侵略国家发表了《联合国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正式建立,中国与美英苏三大国一起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后,中国又为它的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还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创立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是联合国最早倡导国之一,在联合国筹建过程中,中国站在公正立场上,代表弱小国家的呼声,要求联合国在其组织、宪章与活动中坚持反对殖民统治,实行民族平等及民族自决原则等,为联合国宪章的制订做出了积极贡献,从而,被认定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创始国,为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中国学者的上述成果,填补了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空白。

三是探讨了二战对战后世界的影响。其主要论点是:

其一,二次大战是20世纪世界历史从前半期的战争与动荡时期,向战后持久和平时期转换的转折点。二次大战摧毁了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从根本上动摇了殖民主义统治的根基,促进了殖民体系的分崩离析,改变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多极世界格局,形成了美苏两极世界格局,导致了国际和平力量急剧增长。这些因素共同构建了战后和平的基石,为世界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和平的国际环境。

其二,二战的胜利宣告了自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建立的以征服与掠夺求发展的旧模式的结束,催生了战后世界以平等与依存求发展的新模式的诞生。在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封建主义的发展模式,即以征服与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来发展本国的发展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是人口占少数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着人口占多数的殖民地半殖民国家,使得占世界大多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丧失主权,经济更加落后,社会停滞不前,人民处于极度贫困状态,导致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战乱频仍。于是,这种以征服与掠夺求发展的模式孕育出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二战表明,用战争征服他国求发展之路是一条自取灭亡之路。二战猛烈地冲击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旧秩序,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面,表明资本主义旧的统治方式和发展模式不能照旧延续下去了,促使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放弃以剥削殖民地半殖民地求发展的旧模式,走上了自我发展之路。战后,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革命与改革的浪潮,各国都相继走上了自我发展之路,便形成了战后世界“以平等与依存求发展”的新型发展模式,带来了世界社会经济的持久发展和空前繁荣。

其三,二战的胜利打破了殖民帝国主义的一统天下,形成了战后各种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并存共处的多元国际社会。在二战期间,为了抵抗法西斯的侵略,各种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际地位的国家,在反法西斯的旗帜下,并肩作战,生死与共。尤其是在国际社会占大多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二战中积极参战,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战后,这些国家相继获得了独立,形成了发展中国家。正是由于有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携手合作的经历,战后,在国际社会中,无论是大国、强国、富国,还是小国、弱国、穷国,均超越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宗教信

仰、文明文化的差异,每个国家都有有生存权、发展权和话语权,从而形成了和而不同的多元国际社会。在战后多元国际社会中,虽然各国享有的平等权利是相对的,强权政治、霸权主义仍然存在,但各国毕竟都是国际社会承认的主权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享有参与权,标志着国际社会民主化程度的提高,是战后世界进步的重要标志。

其四,二战的胜利推动了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战时,美英苏中四大国及盟国,以各种形式举行各种会议,就战后建立一个和平和繁荣的世界进行了多次磋商,尤其是雅尔塔会议,确定了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和框架,被称为雅尔塔体制。尽管雅尔塔体制深深打上了美苏等大国谋求势力范围的强权政治烙印,但雅尔塔体制关于战后世界安排是以建立战后世界和平为主要目标,提倡和平、民主和各国独立原则,建立联合国作为协调国际争端,维护和平的机构等等,都体现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确立了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框架。在此前后,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为三大支柱的战后世界经济新秩序宣告成立,为战后世界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保证。同一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相比,二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是建立在几个战胜国一己私利的基础上的,后者是建立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基础上的,是为了维护世界整体和平;前者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基础上的,维护的是资本主义统治的世界秩序。后者是建立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基础上的,维护的是世界各国利益的世界新秩序。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在美国旧金山正式成立,其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人类进步与发展。尽管联合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被少数大国所操纵,成为霸权主义的工具,但从总体上讲,联合国在反对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支持各国独立与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伸张国际正义等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其影响、威信与作用日益增强。中国是联合国的主要创始国之一,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联合国的创立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联合国的成立,是维护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最重要的国际组织。

尽管中国学者关于二战对战后世界的影响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无疑是大大拓宽了二战史的研究领域。

总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二战史研究是高潮叠起,新意层出,人才济济,硕果累累,为我国学术园地争芳斗艳,增光添彩,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献上了一朵艳丽的奇葩。

(胡德坤,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邮编:430072;

赵文亮,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邮编:453007)

(责任编辑:于 沛)

(责任校对:王 凌)